

第十三章 天皇的决断

原子弹爆炸的冲击

“今天，遭到了敌方可能是特殊高性能炸弹的攻击，损害很大——”从设在广岛市内的第二总军司令部(军司令官烟俊六元帅)向东京市谷台的参谋本部、陆军省发出了具体内容不明,但发生了可怕事态,这样简短的电报,时间是8月6日上午11点左右。“仅知道在广岛发生了说不清楚,但却事态严重的事件,是在6日的中午左右。”这是当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的有末精三中将的回忆。究竟被害状况如何呢?当时东京和广岛之间的通信联系全部断绝,这使市谷台上的大本营省脑部焦躁不安。

广岛市受害惨状,在入夜后开始以片断的、稍系统的形式传到大本营。由于一发炸弹,而使约有312000人、76000户的广岛居民遇难,瞬间被炸死及行踪不明者,达200000(在被炸当时据称是130000人),伤者约35000人、15000户居民及房屋化为灰烬,继而发生的大火使约57000户房屋被烧,市内约60%、计44平方公里的地区变为废墟,这种地狱般的场面,还在不断扩延,具体状况尚不得而知。

随着广岛市周围部队不断发来的报告,逐渐知道了美军空袭的性质、广岛市惨遭破坏的规模等实际情况。在第二总军的“第一报”中所说的“特殊高性能炸弹”,通过对空袭时各城市上空散下的烧夷弹的化验分析,使大本营一些人怀疑这是完全有别于一般炸弹概念的,依靠“物理变化”进行革新的兵器。因为,当天空袭广岛时仅有三架B29型飞机,并只投放了一枚炸弹。随着令人头

晕目眩的闪光，在惊人的轰响中，升起了从未看到过的蘑菇云，广岛这座大城市在一瞬间成了一片瓦砾。

大本营中，最早注意这种情况的是有末中将。他受陆军的委托，在理化学研究所博士仁科芳雄的指导下，悄悄进行着原子弹的研究，但规模极小，研究者仅二十余人。这与美国的原子弹研究状况不能比拟，美国有125000名研究人员参加研究，有巨大的秘密工厂，总额为20亿美元的巨额经费。日本因为没有成为原子弹“根基”的铀矿石，所以研究本身就是在探究能否制造原子弹，这就是说，制造原子弹还是遥远的梦想，即“试管性研究”。在职务上间接地涉及到日本原子弹研究的有末中将，当然理解广岛非同寻常的破坏，不是受一般烧夷弹的攻击所能造成的。

为要证实这一忧心的疑虑，8月7日凌晨一点多，同盟通讯社(现在的共同通讯社)的川越受讯所接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如下的声明：“16小时前，美国一架航空机向日本有实力的陆军基地广岛，投放了一颗炸弹，那是原子弹。其破坏力相当于20,000吨梯恩梯火药——我们的用意，是要更为迅速地完全毁灭日本土地上任何城市的所有生产事业。

7月26日，最后通牒之所以在波茨坦发表，是为了不让日本国民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如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波茨坦公告》所列)，他们就要受到空中降下的、未有先例的火热雨的袭击。”

有末中将说：“知道是原子弹，似乎是在6日夜里。因为我是见过理化研究所‘二号研究’(原子弹研究，取仁科博士之二的匿名)实况的少数军人之一，所以大致能推测原子弹是何物。因此想尽早赶往现场，考虑采取适当的办法。那天夜里，向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征求意见时，河边说：‘要把仁科博士一块带往广岛。’

河边任参谋次长前在陆军航空本部工作，所以他知道仁科进行的原子弹研究(原子弹研究部门是航空本部)，未到参谋本部时说过‘要真正进行研究的话，需要一亿或二亿金额，哪一军也不

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么多的钱，这是令人愁苦之事。’

不管怎样，我去现场视察，是为了考虑当前的措施和今后再被投放原子弹时的对策，所以想把仁科先生及许多军医和有关技术人员带去。立即进行了人员配置，在7日下午2点左右，分乘两架飞机去所泽机场。在机场起飞时，我记得仁科先生明确地说到：‘落在广岛的是原子弹啊’。”

以有末中将为团长的视察团，当然成了大本营正式派遣的广岛受害调查团。在视察团所乘的两架飞机中，其中仁科博士等所乘的一架，在靠近富士山时引擎失调，又返回所泽，第二天即8日再次飞向所泽。人类初次经受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在科学家的眼中得到了确认。

同盟通讯社接收的《杜鲁门声明》，立刻传到了外务省、陆、海军省和宫中等处。8月7日中午，木户内大臣在宫内大臣室的例行聚餐席上，收到了这个报告。“昨天早上，接到了美国对广岛使用原子弹，危害极大，死伤十五万余人这样的报告。”

饭后，木户内大臣拜见天皇，陈述了关于非常事态的对策。“（下午）1点半到2点5分，在文库晋谒，如何收拾残局，天皇很关心，进行了种种垂询。”

木户说：“知道美国有原子弹，这是当然的，但听到是投在广岛时，非常吃惊。因此，我想立刻晋谒天皇。”

7日那天中午聚餐时，有关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受害极大的报告，是莲沼蕃侍从武官长送交的。

因此，我直接想到，美国究竟有几颗具有那样强大威力的武器呢？如果美国再使用那种武器，不管军人们怎样拼命作本土决战，也是白费。应该尽早结束战争，哪怕是提前一刻也好。所以，我请求立刻拜谒。

见到陛下，我说了如下种种意见，用原子弹那样的武器把日本国民弄得流离失所，使日本国土支离破碎后再结束战争就晚了。应该火速推进终战进程等等。看上去，陛下已从武官长那里

听说了关于原子弹的事。陛下很清楚日本的战争已到了最坏的时候，但是，他并不慌张，毅然说到：‘既然到了这般地步，如不早点结束战争的话——’

最让人担心的就象刚才说的那样，美国究竟有几颗原子弹呢？就是说，如果也在东京投下不就糟了吗？到那时，请求陛下退位是否可以呢？但是，陛下现在的心境是，不使人心慌慌，关于退位之事，一点也没提。”

走向投降之路的车轮已发出转动的声响，开始启程了。

苦等答复——苏联参战

广岛被投下原子弹后，在大约8小时45分钟后的6日下午5点，东乡外相给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发去电令，让他火速会见莫洛托夫外长，督促苏方就派近卫特使访苏之提议做出回答。这是因为得到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于6日从波茨坦回到了莫斯科。随后，7日下午3点40分，又发出了督促电：“形势日益紧迫，必须迅速弄清苏联方面的明确态度，火速传报苏方的答复。”

日本陷入濒于灭亡的危机关头，在这一“火速传报答复”的训令中明显可见。

结果，这封电报成了与“近卫访苏”，即以苏联为中介进行和平交涉有关的最后一封电报。与此同时，8日中午，佐藤大使向国内发电：“7日莫洛托夫发来预告，明天即8日下午5点进行会见”。此即日本时间8日夜里11点。到那时，苏方态度如何呢？外务省官员内心喜忧参半地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近卫依然待机准备苏联之行，预备着一旦有了答复，马上从靠近高崎市的军用机场飞往满洲里。

据东乡外相在《时代的一面》中的记载，外相于8日下午拜谒天皇，上奏了应该以原子弹爆炸为契机，断然结束战争的意见。天皇说到：“是那样。既然敌方使用了这种武器，继续战争越来越

不可能了，我想为争得有利的条件，而错过了结束战争的时机就不好了。另外，即使谈判，不是也不能商妥吗？所以，望推进终战的进程，以早日看到战争的结束。”并要他向铃木总理传达这一意旨。外相从“作为大元帅的陛下”的角度，理解了天皇所做的不能继续战争时，就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终战的决断。

晋謁天皇之后，东乡外相在同日下午5点会见了木户内大臣，传达了天皇的上述意旨。又向在首相官邸的铃木总理作了说明，提议尽早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向15日投降的充满波浪和混乱的历程，就是以这次会议参加者们的动向为主轴展开的。

8月9日零时左右，苏军飞机突如其来在满洲各处越境，空袭关东军阵地，同时，也轰炸了新京(长春)。接着，重型大炮铺天盖地似地一齐发射，有无数战车开路的机械化军团，以东部国境为重点，在几乎整个满洲，似乎全部插入了钉子，蜂拥地突破了国境。被誉为国军最精锐的关东军，已把它的主力部队调到了南方战线，防卫力量极为薄弱。前沿阵地被苏军击破，关东军溃败。

在此之前，在莫斯科的佐藤大使按照苏方指定的8日下午5点，到克里姆林宫拜访莫洛托夫外长。日方连续催促苏联就“近卫访苏”作出回答。对此，苏联究竟取何态度呢？在此之前，虽然觉得苏方有接受之意，但并没希望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不过仍抱一线希望。莫洛托夫外长在大使开口前，首先宣读手中的文件，那是日本最恐惧的对日宣战书。

宣言书是这样开始的：“希特勒德国战败后，日本成为继续战争的唯一大国。”它的要点为：

① 日本因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所以日本向苏联提出的对英美实行和平的依托已失去了基础。

② 因此，苏联基于联合国方面的请求，为促使日本投降，而参加对日作战。

“苏联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和平，拯救各国人民今后免受新的

牺牲与苦难，作为使日本人能免遭德国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蒙受的危險和破坏的唯一途径，从8月9日开始，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莫洛托夫外长一读完，就把宣言书亲手交给大使，退席而去。

苏方虽保证把这一宣言用电报通知日本政府，但宣言书始终没到东京，不知其原因何在。日本政府“正式”收到这一开战宣言，是在8月10日上午11点多开始的一个多小时的东乡外相与马立克驻日大使的会谈上。马立克大使要求会见外相是在前一天的9日，外相以忙为由，传话延期一天。对于我国来说，正是9日，确切地说正是从9日深夜到10日黎明的约三个小时，应该说是昭和史动荡的顶点，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历史关头。

那末，苏联为何在8月9日走向对日作战的道路呢？据战后公开的资料，苏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对日战略的基本构想，是在1945年6月下旬，预定在8月20日到25日之间开始攻击。在波茨坦与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谈同时举行的三国军事会议上，安托诺夫参谋总长发言时谈到：“8月底参加对日作战。”但是，到8月7日斯大林命令苏军最高司令部：“8月9日黎明开始进攻。”从以上的过程考虑，几乎可以认为，是由于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才使苏联提前了参战的日期。

向广岛投原子弹的是在提尼安基地起飞的蒂贝茨大佐机长驾驶的B29“依诺拉·盖伊”号。三天后，担任观测广岛投放原子弹任务的C·斯伊尼少佐驾驶的B29“波克斯卡”号，9日天亮前，在同一基地起飞，为的是向第一目标小仓，第二目标长崎投放钚原子弹。

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B29型飞机开始轰炸，是在1944年11月底。真正的轰炸是从1945年3月9日到10日东京下町的大空袭后。在此之前投下的烧夷弹7080吨，3月9日后的10天时间，投了9373吨，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受到了很大破坏。所投炸弹数量：3月为13,800吨，7月增加到42,700吨，到最后停战时

共投下约147,000吨(德国被投炸弹 1360,000 吨)。此外,还投了12,000个机械水雷。受攻击的城市有66个,其中约40%的地区受到焚烧和破坏,城市居民的30%丧失了房屋和财产,由于9个月的空袭市民死伤者约达810,000人(包含原子弹受害者)。到8月9日的这段时间,日本所处的是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

接到苏联参战的消息,东乡外相于8月9日早上8点在小石川的私人官邸拜访了铃木总理,重述了昨天天皇断然结束战争的决心。首相看了一下身旁来报告苏联参战消息的迫水书记官长,带着茫然的神情说到:“这届内阁结束战争吧。”外相接着希望书记官长火速安排好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日程。

铃木首相在《投降的表情》中回忆道:“终于,投降的最后时刻到来了,我扪心自问,悄悄地对身旁的迫水君说:‘必然要到来的事终于来到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是实施陛下尊意的时候了。”

如果是通常,内阁由于以苏联为中介进行和平交涉的政策完全受挫,在苏联参战的情况下,作为辅佐的责任,内阁必然实行总辞职。但是,鉴于事态的紧迫,决心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

在这一“回忆”中,有两处重大的不可忽视的地方,其一是“实施陛下的尊意。”象已看出的那样,天皇的想法就是早一点停战,所以,在因军部特别是陆军力主本土决战,而造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发生纠葛时,“天皇的尊意”就成了决定国家意志的构想。其二是为使这一方案得到实现,铃木内阁无论如何应推进事态的发展,认识到无论怎样艰难,也绝对不能全体辞职。

迫水书记官长根据这一前提,谈了两个方案,即:(一)接受对苏宣战诏书,走向一亿玉碎的战争;(二)接受《波茨坦公告》,立刻结束战争,他主张应采取第二种方案。

首相作了短暂的思考,觉得“不管怎样,要报告给陛下”,就进宫了。9点左右,首相从宫中回到官邸,指示迫水书记官长,

要加快结束战争的决心，并安排由此决定国家意志所必需的各种手续。

首相晋谒天皇后，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作了短时间的拜谒，一般认为这是报告苏联参战的消息。接着，同日9点55分，木户内大臣晋谒天皇。

木户氏说：“这次拜谒时，从陛下那儿初次听说了苏联参战的事，吃惊的同时，觉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须终战。派“近卫特使”的最初提议者因为是我，所以，对苏联参战虽然震惊，但另一方面，已潜在地认识到了苏联是不是信赖的国家，因此，并没感到非常意外。当然，在此之前，干脆直接说出终战之事相当难，我想现在终战的机会到来了。”

内大臣在更早的时候曾谈到：这时，天皇“关于收拾战局，觉得有火速研究的必要，他要与首相作充分的商讨。”10点10分，铃木首相访问木户大臣。内大臣传达天皇意见的同时，“着力劝说，这时，要迅速利用《波茨坦公告》，把战争导向终结。”木户氏说：“为要‘果断’终战，很好的依据就是《波茨坦公告》。听到公告发表时就想，这一公告如有‘余地’的话，日本所处的状况是不得已的。所以，反倒认为有了那一公告，对于推进终战很有好处。自然我对首相谈了自己对利用、接受公告，以加速停战的想法，联合国再也不会提出更坏的条件了。”首相听完木户的发言后，以简短地言辞说到，10点半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态度。说完，起身离去。

因接受公告而引起的激烈争论

仅有6人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8月9日上午10点半多在宫中召开。铃木首相首先发言：“从广岛被投原子弹和苏联参战这种四面受击的情况看，我觉得再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了。无论如何也要接受公告，结束战争，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关于这

个问题，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首相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而终战的提案后，会场陷入痛苦的沉默之中。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等在考虑是否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一根本问题。在陆军看来，因为国内还有没参战的300万军队，国外有200多万军队，所以在中央军中，占主流的意见认为，应进行本土决战，给敌人以沉痛打击。在两位大将的沉默中，包含了这样的想法。

海军大臣米内开口了。“只是沉默就能有办法吗？我不客气地谈谈意见如何？如果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是无条件承认呢，还是提出我们希望的条件？这个问题，我想必须讨论。”具有长老资格的米内大臣继铃木首相后的这个发言，使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要附加希望条件、自然成了会议的议题。

根据军令部总长丰田的回忆录《最后的帝国海军》的记载，米内海相接着说到：“如果附加条件的话，要审议的不是这些问题吗？”并提出了要附加的以下四个条件，让大家审议：（一）政体的维护；（二）（由日方）对战犯的处罚；（三）“解除武装的方法”（四）“占领军的进驻问题。”

米内海相的这些条款，在东乡外相的回忆录《时代的一面》中没有记载。如果按丰田的说法，在会议开始，米内海相就压制了陆军的意见，把会议的主题集中到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时，附加什么条件的问题上，他的这一“政治手腕”，在终战史中是应特别加以高度评价的。

对于“米内提案”，东乡外相首先发言，他说：“这时，如接受《波茨坦公告》，国体的维护另当别论，附加其他条件会妨碍谈判的顺利进展，还是放弃为好。”米内海相同意外相的这种想法。在会议上，继续对这四个条件逐条审议。

首先，关于第一位的国体的维护。与会者6人一致同意定为“绝对条件”。在第二条战犯的问题上，参谋总长梅津认为，应尽量主张由日方来处罚。关于第三条解除武装问题，参谋总长、阿

南陆相、丰田军令部总长三人，强调用自主的方法。在讨论第四条占领军进驻问题时，参谋总长、陆相谈了“尽量小范围、少兵力、短日期”，这样希望征得联合国理解的意见。以上摘自《最后的帝国海军》一书。丰田在回忆中写到：“对于以上各种说法，首相、海相没过多发言，似乎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因为支持外务大臣的主张，附加受约条件终究白费，所以，除了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外，别无办法。”会场仍是议论纷纷。

这次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长崎又被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到下午1点还没有结论。首相提议，下午在预定召开的内阁会议之后，再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现在会议暂停。

铃木首相下午1点半，会见了木户内大臣，做了会议的“中间报告”。首相的报告虽是短暂的，但给内大臣等带来了困惑和紧张。这也是增强急迫感的终战史上的一根弦吧。

根据《木户日记》：“铃木首相来到我的房间，关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谈了如下决定：一、承认皇室。二、自主性撤兵。三、在本国处理战争责任者。四、不得保障被占领这样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没有定下结论，可偏偏这里作了‘结论’，而且还是东乡外相看作最为‘危险’的附加四项条款接受公告案。”

铃木首相真是这样报告的吗？还是有某种特别的意图，故意这样报告的呢？或者是首相理解错了呢？还是内大臣听错了？关于这中间的原委，《终战史录》也写下了这样的疑问：“六人会议的总的空气，是讨论四项条件为主。铃木首相的内心或许与此接近吧？还是因为首相强调妥协到如附加四项条件，陆军，海军统帅部都能接受的地步这样的意旨，而使内大臣产生了误解呢？”《木户日记》接着写道：“无疑，这时木户内府知道了在附加四项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事，如同木户内府在左道旁门了解的那样，同一情报传到了近卫公及其他官员处。近卫担心，就通知了高松宫；另一方面，决定告诉前外相重光，让他说服木户内府，使其

决意恳求天皇的决定。”

《木户日记》还谈到，下午2点45分，高松宫直接来了电话“担心如附加条件，恐怕联合国会拒绝。”这样讲了自己对前后办法的意见。还有，同日下午4点，“重光到我的房间，论及如附加条件，谈判必会决裂，”切望妥善处理。

那时，由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内阁会议推迟到下午2点（下村情报局总裁记为2点半）召开。因此，主持会议的铃木首相无疑知道了在内大臣身边发生的“紧急事态”，于是，就向木户内大臣寻问经过。

木户内大臣回忆说：“铃木首相把那附加的四项条件拿给我时，还没把它上奏（天皇）。那时，形势时刻在变动，首相就到我这儿说明事态的进展状况。最为关键的是首相没有上奏天皇。如他拜谒天皇，告诉陛下，把接受四项条件，作承认公告的决定，陛下也许说：‘知道了。’那样的话可就不得了。所以，关于首相的报告，我没有报告陛下。这不是所谓的‘有胆有识’，特别不是自觉的，而是自然使之。”

另一方面，似乎是首相决定提出四项条件，接受公告的情报，传到近卫那里后，惊动了高松宫、重光及外务省的加濑俊一等，想必做了种种努力。事实上这些来自外部的活动，更坚定了我内心的想法，因此，在3点10分和4点35分晋谒时，对陛下说到：‘首相似乎有了这样的决定，对其决定也有这样的反对意见。或许有人上奏决定的内容，即我方提出在四项条件下接受公告，到时，请陛下说出不附加区区条件这样的尊意如何？’由于陛下对事情的经过很清楚，所以说道：‘清楚了。’这暂且不说，高松宫、重光君的意见，也坚定了我的想法，这是事实。”

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类似“杯中的爆风雨”这样的用词的错误，但是，那种片言只语的小流，逐渐汇成了大河。

为说明内阁会议，有必要介绍东乡外相《时代的一面》里的记述。“内阁会议从2点开始召开，会前，我就想在会上与总理达

成一致意见是有困难的，那时，只好仰求天皇的决断。心里想，注意不要因陆相的辞职，而使内阁不能发挥其机能。”

在终战史上的“圣断”一词，最初是作为具有具体背景和内容的东西被记载下来的。当时，已有记载，情报局总裁下村拜谒天皇，请求不管是和还是战，都要通过收音机广播，直接号召国民，并得到天皇的允许。

临时内阁会议从预定的中午推迟到下午2点半召开。外务省编的《终战史录》，对会议情况，作了简短而生动地记录：“内阁会议开了3个小时后，休息了一次，从6点半又开到夜里10点多。会上，铃木首相有力地领导了阁员。讨论的中心就是在上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争论过的，与《波茨坦公告》有关的条件。会上，阿南陆相、东乡外相和米内海相的激烈争论成为中心。米内海相在上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没有过多发言，在内阁会议上论及对战争的推测，与陆相形成尖锐对立，坚决支持外相的维护政体论。阿南陆相、米内海相似乎改变了上午的态度。首相问及各阁员是否赞成外相的意见。阁僚中有二、三个人反对外相的观点，支持陆相的意见，也有人态度暧昧，但大部分阁僚支持外相，会议没达成一致意见。晚10点休会。

另外，在内阁会议进行中，外务省的松本次官又以急迫的心情会见了迫水书记官长，告诉他长崎又落下一颗原子弹，说内阁会议不会得出结论，我们应分别催促外相、首相仰求天皇决断。迫水书记官也有同样想法，就说共同努力吧，而后两人又互相勉励了一番。”

内阁会议是如何的紧张，我们选出几个发言看看。东乡外相：“日本民族能永远置于皇室的领导下，就不会泯灭。只要维护了政体，所有的痛苦都能忍受——这就是拯救日本的道路。因此，《波茨坦公告》不包含是否承认皇室的存在的内容，除了全部接受公告，以图结束战争外，别无办法。如陆相所说，我也渴望实现四项条件。但是，不管怎样，不能认为那是关系到日本存亡的绝

对条件。公告中明确写着对日本的占领不是永久占领。解除武装可在接受公告后的停战谈判中协商。关于战犯的处理，很遗憾，可是，难以认为那就成了继续战争的重要条件。”

阿南陆相：“保障占领后，言行就会不自由，对方就会为所欲为。战局不分上下，不互相角逐，不能看作是失败。”

米内海相：“作为科学战、武力战，不是明显的失败吗？会有局部的武勇传暂且不说，自布干维尔岛战以来，塞班、吕宋、莱特、硫黄岛、冲绳都失败了。”

陆相：“在会战中失败了，可战争并没有失败，陆海军之间的感觉不同。”

夜里10点半，内阁会议什么也没能定下来就散会了。最后的办法就是求天皇的最终裁决，即仰求“圣断”。

再说内阁的决定，这必须有全体阁员的同意，既使是一个人，只要有不同意见，就会因内阁意见的不统一，而招致内阁的总辞职。因为不能胜任天皇大权的嘱托，铃木首相几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及内阁会议，其理由就在此。如果总辞职的话，陆军有可能组织继续战争的内阁。最坏的时候，就会处于围绕接受《波茨坦公告》不允许拖延一刻的情况，也许会陷入不能组阁这样的大混乱状态。这就意味着日本的破灭。如果那样的话——。

《东乡茂德陈述录》中这样写到：“阁僚的意见不一，因此，总理和我共同拜谒天皇，因为想把这之前的讨论情况上奏天皇，所以内阁会议就如实告知宫中。而且，总理让我加以说明，所以我就把这之前的议事经过，详细地上奏给陛下。总理向陛下请求：鉴于目前的形势，请允许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御前会议，陛下同意后，立刻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木户日记》中记载拜谒的时间是夜里11点左右。这时，铃木首相请求让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列席御前会议，得到了准许。枢密院是回答天皇咨询的机关，接受《波茨坦公告》，形式上是缔结一种条约，得不到枢密院的咨询，就不生效。因此，提前让平

沼枢密院议长作为代表列席会议。

这里似乎有重复之嫌，但必须弄清的是，继上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间休息后，二次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讨论的焦点在于“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时“保持国体”，是绝对的条件。但是，除此之外，解除武装等“三项条件”，能否附加提出呢？这就是问题的集中点。在这一决定阶段，意见截然对立。再来看一看“平沼枢相的列席，”并不是单单赋予再次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以同样的形式，表明了铃木首相坚定意图，仰望“圣断”、一鼓作气收拾事态的意志。

还有一件幸运之事，要召开御前会议，必须有首相、陆、海两总长三人签名同意方可。在自上午到下午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后，迫水书记官长以“因紧急情况”这样含糊的理由，承蒙两总长签了字。这也不能不认为是仰望“圣断”的秘密准备。此时，是否果然“确信”了要仰求“圣断”呢？暂且不管，但在这一文件上签字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仰望“圣断”的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同日在宫中文库地下深深的防空壕里二次召开，时间是夜里11点50多分。因为是突然召开的御前会议，所以，预先并没通知给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所有成员。军令部总长丰田在他的回忆中，再现了当时那种“吃惊”的场面。“自上午召开的战争指导会议没作出任何决定就中断了，但不管怎样，还是等待继续会议的通知，可是，到了半夜，也没有任何联系。刚一想到今夜不开了时，11点半左右，突然接到通知，要召开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天皇第一次决断

参加御前会议的有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位成员，枢密院议长平沼骥一郎列席，总合计划局长官陆军中将池田纯久，书记官长迫水、陆海军省军务局长、侍从武官长陪席。根据与会者的回

忆，会议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举行，虽有换气装置，可热得让人窒息。

会议上，除了外务省翻译的《波茨坦公告》的译文外，还放着会议的提案，即：只把保持政体作为接受公告的条件——东乡案(甲案)和容纳其它三项条件接受公告案(乙案)。可根据陆军省军务课的《机密终战日志》记载，阿南陆相看到这两个提案后，对参谋总长梅津耳语到：“停止条件问题的讨论，把战争进行到底，再讨论下去吧”，据说总长马上同意了。这件事意味着陆相、总长都还不知道要仰求天皇决断。

会场里，擦拭额头汗滴的白手绢，时而晃动着。

首相宣布开会。接着，外相冷静而思路清晰地论证应该采取“甲案”；继而米内海相简单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外相的意见。陆相接着发言，他首先说到“绝然反对”，并以激烈的语气陈述了他的理由：“现在，我方的战斗力并没有绝灭，仍有自信进行本土决战。即使并排死去，也应成于大义。非此，不就会被海外各国的军队无条件地缴枪吗？战到最后，就会使日本的道义、正义和勇气永留后世，同时也就保持了政体。所以，如用乙案能停止战争的话，我赞成采取乙案。”参谋总长：“完全同意陆相(所述)。”他谈了作战方面的意见。枢密院议长平沼因是突然出席御前会议，所以不清楚在此之前的讨论过程，费了很大工夫才打听到了对苏交涉经过。他终于“赞成甲案”，只是就甲案中的“在理解了不包含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要求这样的前提下，”及有关“国体保持”的文字，极力主张把它改为“在理解了不包含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这样的前提下”。他的提议得到一致同意。军令部总长发言时说：“前线的将兵中间还充满着特攻精神。”他同意了陆相、参谋总长的意见。

时针已指向了10日凌晨2点。从气氛上看，讨论仍不会得出结论，与会者的目光自然集中到了首相身上。这时，首相慢慢站起身来，说到：“会议已进行数小时了，很遗憾仍不能作出结论，

但是，事态已不允许有一刻拖延。在此作为例外，拜请天皇决断，由陛下为本次会议作结论。”

首相离席慢慢走到天皇面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说到：“会议的情况，就象您听到的那样，说起来令人异常地惶恐，我想祈求您的指示。”

铃木首相曾作为侍从长扶持天皇身边，并与天皇作过很深的交谈，天皇正襟端座，稍稍动了动上身，说到：“可以回到座位上。”耳聋的首相，用手围着右耳仰视天皇。天皇重复到：“您可以回到座位上。”天皇见首相回到座席，稍微向前探了探身体，开始平静地讲话。

“大日本帝国”的战败的宣言，现在就要由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大元帅的天皇决定了。当时会场的情景，请看内阁书记官长迫水描述：“‘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听到陛下说这句话时，我心头掠过这样一种放心的感觉，长期悲残的战争从此就要结束了啊。但同时，觉得陛下虽说要终止战争，可从各种形势看，果真能结束战争吗？不会的，或是能否平安地结束战争呢？这种不安涌上心头，我的心情真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陛下听完了与会者的意见后，说到：‘那样的话，我谈谈意见。’会场紧张起来，我脸朝陛下，一句不漏地做记录。

‘我同意外务大臣刚才所说。’然后又说到：‘为此，我要申明。’突然，他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擦了擦眼镜，我再也压抑不住，流下泪来，更不用说做记录了，只记下了开头的两、三行。但天皇的话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陛下在御前会议上的讲话非常长。那不是饶舌，因为句与句的间隔长，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话，所以陛下是慎重又慎重，极力要用恰当的言词来讲的吧。话讲得很慢很慢，似乎有我们讲话五倍长的时间。

‘战争开始以来，陆海军所做的多数是事与愿违。现在，陆海军正在准备本土决战，说我方有胜利的机会，可我正担心这一

点。

前几天也听参谋总长说了九十九里滨的防卫对策，可与侍从武官视察现场后的报告截然不同。报告说装备完毕，可实际上有的上兵连刺刀都没拿。在如此状况下，进行本土决战会如何呢？我非常担心。那不是会导致日本民族的毁灭吗？那样的话，从皇祖皇宗那儿继承下来的日本国，就不能传给子孙后代了。

要把日本国传给子孙，既使多一个国民生存，也要让他们生存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国将来重新站立起来。继续战争，不只是日本国民，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也会遭受大的损害。

我想，让忠勇的军队投降，解除他们的武装，是难以忍受的事情；处罚战争责任者，因为他们也是尽忠之人，所以也是难忍之事。但是，要拯救全体国民，维持国家大政，对此必须忍受。我现在正考虑，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时的明治天皇的心情。大家在这种时候会为我担心，但我怎么样也没关系。我在这样考虑，决定立刻结束战争。”

“圣断”下达了。这是10日凌晨2点30分。3点，再次召开内阁会议，甲案，即“东乡案”，增加了枢密院议长平沼的修正意见后，作为内阁的决定，在会上一致通过。在这次会上，阿南陆相还发言说：“只要不确定保全皇室，陆军将继续战争。”首相、海相表示同意。

外务省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写成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案文，经过修改，同日早晨6点45分和7点15分，分别向在瑞士的加濑公使和在瑞典的冈本公使发出急电，要求把案文传达给联合国，并速作回答。另一方面，书记官长迫水回到首相官邸，立刻起草了《终战诏书》。

圣断下达后的8月10日和11日，是面临终战前的“空白的二日”，因为，10日，圣断的内容传到军部及各界上层。11日是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同时苦苦等待联合国回答的24小时。这两天，在政治、军事上没有令人惊愕的事情。

从10日到11日，陆军省开始笼罩着浓密的骚然空气。军务课的《机密终战日志》中记到：“陆军大臣要利用其维持治安的兵力使用权，断然发动实质性的政变，各位将士情绪激昂(11日)。还有人扬言，应该处死平沼、近卫、铃木、米内这样的重臣人物。”但是，在参谋本部，如参谋次长、中将阿边虎四郎在11日的《日记》开头写到的那样：“(续昨日)今天从早上开始，办公室里终日弥漫着茫然若失的气味。”

再说，10日下午2点开始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接受公告实行终战的决定，在何时？用什么办法？告诉国民。会议决定，要用“终战诏书”的形式公布于国民，在公布前，还得使更多的国民心里有个准备，并以《情报局总裁谈》为题，于当日下午4点30分发表(11日登于报纸)。但是，其内容只是给国民一个与求得进行的本土决战相反的印象。

但是，下午7点的收音机在播出勇猛雄壮的进行曲后，广播了《陆军大臣布告》，声言“纵食草啖泥，露宿荒野，也要断然作战，深信会在死中求生，是即楠公(即楠木正成，后醍醐天皇时的武将)七生报国”，并在11日的报纸上，与《情报局总裁谈》并列登载。这是为维持前线将兵的士气，防止混乱和动摇而写的，但抗战派的陆军省课员，在未通过大臣决裁前，就传到了国民中间，结果导致了混乱。

另一方面，12日夜，内务省为使知事有个心理准备，以极密电报向各地方长官通报了10日御前会议的决定。

8月12日《贝尔纳斯答复》

8月10日上午7点半，华盛顿从东京广播电台对海外的新闻广播中，收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

同日上午9点，在白宫由总统杜鲁门、陆军长官史汀生、国务卿贝尔纳斯、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还有总统顾问，召开了紧

急会议。审议对日本的《答复》，会议的情况，在与会者五人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

在第十一章《波茨坦公告与天皇制》中，我们已知史汀生，就日方作为“唯一的条件”的“天皇统治国家的大权”制，向总统说到：“既使日方不提出那个问题，……为了避免硫黄岛、冲绳及其它令人恐怖的流血事实，也必须利用天皇。”他还向总统说道：“因为只有天皇才是把日本置于国家理论最高权威下的唯一根源。”

利斯伊提督写到：“劝说总统接受日本的提案。我想还是让天皇维持其一切大权为好。为顺利实现投降，相信有必要拥立天皇。”接着，写到：“下午2点，总统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一起着手起草向其他联合国元首，提议接受日本投降提案的文件。这一文件计划送给英国、中国及苏联，但必须首先弄清的是天皇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的立场是‘天皇统治国家的权力，要置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

这个《答复》，是在国务卿贝尔纳斯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征得了联合国的同意。8月11日，经瑞士政府送到了日本。另外，美国政府把对日的《答复》作为新闻，通过对海外广播传播。8月12日上午零时30分，日本的同盟通讯社通过旧金山的广播，开始收到《答复》。

我们看一下各国对“美国案”的态度。

象在《波茨坦公告与天皇制》一节中叙述的那样，英国认为，让天皇以天皇名义在投降书上签名并非贤明，应要求天皇作为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者签名，除此之外，同意美国案。这大概是由于英国与日本一样，同样是王室制的政体有关吧。

中国的蒋介石表示：“日本最终的政治形态，要由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全面同意美国案。

问题在苏联。莫洛托夫外长对美、英两国大使说，日本提出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这违反了无条件投降的方针。大概是苏联参战仅3天，所以，为了拖延战争，想增加某种“既得权

益”吧。另外，关于占领日本的最高司令官还主张复数制，并提出了苏联某元帅的名字作为人选。美国的哈里曼大使反驳道：“美国在太平洋战斗了4年之久，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苏联不是刚刚参战两天吗？”苏联才勉勉强强同意了美国案。

另外，三国也明确了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人选。

外务省广播室，还有参谋本部第五课成域分室，在同盟通讯社接收美国广播的前后，都收听到了美国的对日回答，即所谓的《贝尔纳斯答复》。全文如下：

日本政府通报，接受《波茨坦公告》，并要求理解不要把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包括在内，对此，我们的立场如下：

一、从投降时起，为实施投降(条款)，要把天皇及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置于可以采取必要和可能措施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下。

二、天皇要向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要求，给予为实施《波茨坦公告》诸条件所必需的在投降书上签名的权利，并要求给与保障。另外，天皇应命令日本所有的陆、海、空军官及在其指挥下的所有地区的全部军队，为终止战斗行为，收缴武器及实施投降，向所有最高司令官发出必要的命令。

三、日本政府在投降后，必须马上把俘虏和被扣留者用联合国船舶，送到安全的地区。

四、日本政府最后的政府形态，遵照《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来决定。

五、联合国军队在完成《波茨坦公告》中所列各项目以前，应留在日本国内。

1945年8月11日于华盛顿

国务卿 贝尔纳斯

这一《答复》，由国务院通过瑞士政府送给了加濑公使。加濑公使的正式回答电报，在12日下午6点开始到达的。

外交文件往往读一遍难于理解，但这一答复文字简明。不言而喻，“第一项”中的“天皇——统治国家的权力置于——限制下，”和“第四项”中的“日本政府最后的政府形态”，将成为问题的中心所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

收听到《答复》后，凌晨2点多，外务省的松本次官、澁泽条约局长等来到首相官邸，和迫水书记官等就答复文进行讨论。据《松本手记》，（他们认为）可以理解为，“不管怎样，敌方也承认了天皇的继续存在，”决心全部接受，向终战的道路上前进。外务省条约局长作成了《关于答复的解释报告书》，其内容为：

一、答复文是《波茨坦公告》的重复，因此，日方要求进行修正交涉，是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立场相矛盾的。

二、问题中的第一项理所当然。

三、第四项：“明确了敌方没有干涉内政的意图，应该满足。”因此，应全部接受。非此，美方怎么也不会接受修正案的要求。

东乡外相收到松本次官等的报告后，拜访了铃木首相，交谈了接受答复文的事。上午11点进宫，报告给天皇。天皇答道：“我想，照对方回答的那样就可以了，还是那样承诺下来为好。”外相顺便会见了木户内大臣，并作了报告：“恐怕第四项被看成了是国体论者的问题。”外相沉闷的话语使内大臣更为忧虑，那种担心早就有所表现。下午1点40分，本沼枢密院议长拜访内大臣，极力主张“这次的答复从国体论而言应反对”，他似乎是一位所谓右翼阵营的象征性人物。前途的多灾多难，已初露端倪。

送走枢密院议长后，木户内大臣立刻晋谒天皇，汇报了上述事情的经过。可天皇的回答使内大臣深为感动。“我想问题是，在联合国的答复中有‘自由表明的国民意志’的意思，这没有必要作为问题。如果国民的心远离了皇室，即使联合国承认，皇室也不会安泰。反之，如果国民依然信赖着皇室，皇室的存否由国民自由表决，皇室的安泰就更有保障。所以，这些问题干脆由国民自由表决，我想是好事。”

听了这些话，内大臣谈道：“天皇说这些时，我的烦闷一时消失，眼睛豁然开朗。那真是直截简明、彻底的意见，而且渗透了对国民纯真无瑕的信赖。——在我侍奉天皇左右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我所经受的最深刻的铭感就在这一瞬间。”内大臣的铭感，转化成了对实现终战的强烈地期待和自信。

对答复不满的陆军

陆军是以下述兵力决心进行本土决战的，即：陆上兵力：55个师团、22个混成独立旅团、2个战车师团、7个独立战车旅团等兵力，约2,200,000人。航空战斗力——约10,000架飞机。“人间鱼雷”等海军特攻战斗力约有3,300只船舰，兵力约1,300,000人，共计3,500,000人。另外，还有特别警备队约250,000人、国民义勇战斗队主要成员约28,000,000人，以上就是带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构想进行本土决战的总兵力。

从数量上看，在本土沿海粉碎来袭的美军是很可能的。但是，根据1945年2月底大本营的估计，还需要50%的步枪，23%的轻型机关枪，28%的步兵用火炮，74%的战车炮。航空机的75%是把练习机的两翼改装而成的特攻机。

如果冷静地分析这一现实，就会很容易想到进行本土决战时，必将遭受到的极为残酷的后果。但是，要在“死中求活”的军部，特别是陆军，仍妄想着本土决战，而在其战备计划上狂奔着。

随着《贝尔纳斯答复》电文的到达，陆军的中枢，即陆军省军务局格外慌张起来。以上曾提到过，军务局军务课成员们在天皇决断的翌日，即11日发生的“政变案”——发动政变埋葬政府要员，推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迅速走向本土决战的计划正在具体化。

其实，12日黎明，陆军的无线电台也接收到了《贝尔纳斯答复》。军务课的《机密终战日志》写道：“鉴于9日的被动，尽管译文

不完整，军务局长古积正雄、军事课长荒尾兴功和次官若松只一各自分别前往外务次官、书记官长和侍从官长处，就美国答复谈了由于陆军难于接受，而产生的反应。

拒绝接受的陆军

《贝尔纳斯答复》的第一条，即“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置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下”，其原文为“Shall be Subject to”。本意是“从属”、“服属”之意，陆军就那样译成了“隶属”。另外，第四条：“日本政府最后的政府形态”，为故意促使人注意，用西文斜字体写为“The ultimate form of Gornernment——”，即“最后的”、“结局”之意。问题在于与此相连的“(政府形态)由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一旦弄错，战后天皇制就有可能被国民否定，预料到这是很刺激军部的。

外务省接收到答复时，断定这两条一定会成为问题，澁泽条约局长“就想，军人定会依据译文说话，所以必须翻译好。”因此，他和条约局第一课长(后为最高裁判事)商谈后决定，关于第一条，避开“从属”，“附属”这样刺激性文字，意译为“限制下”；关于第四项，用“政治形态或政府形态与国体不同”这样的“解释”，强行排除。

陆军“依据译文”，对《答复》已作了“正译”，军务课并以此完成了《随8月12日敌方答复关于帝国今后战争指导之文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附议案》。这就是“帝国断然拒绝敌方8月12日《答复》的条件，一赌帝国的存亡，真正向完成大东亚战争的目的迈进。”在此方针下，进行“积极强有力地作战，”本土决战，即“一亿玉碎”的战争。陆军在与天皇决断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开始行动起来。

附在此案后的《说明资料》，就是对《贝尔纳斯答复》的分析。选出了重要的第一项和第四项，认为使“天皇隶属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决非与之处于对等的地位，在天皇之上又有统治者，这是

对我国国体的根本性的破坏（侵犯了主权的独立性）”“要细心注意，《答复》以扼杀天皇制为前提，并使其措施合法化。否认天皇的政府，承认人民自体政府，没有这种违反国体本义的理论。”

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商谈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一起拜谒天皇，奏请天皇撤回接受《波茨坦公告》书。这时是早晨8点半左右，比外相上奏早两小时。奏文的意思是，如果按照《贝尔纳斯的答复》，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敌方的意图就是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特别是玷污了作为国体中心的天皇的尊严，使国家破灭。据说，对此天皇规劝道：“收音机广播还不是正式《答复》，关于译文还应加以确证，不要草率进行议论。”面对时刻在剧烈变动着的事态，天皇和军部谁冷静呢？

海军方面今日早上的奏请，因为没得到米内海相的许可，所以，丰田总长和大西次长的行动使海相大为震怒。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军由于有了以海相为最高领导的统一指挥，这与陆军方面必经陆相、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三位长官合议，才能作出决定相比，存在着体制上的差异。同时，米内海相在其部属中的声望之高也可略见一斑。

一般认为，在两总长奏请天皇时，阿南陆相向天皇详细说明了“圣断”下达后陆军的反响。据说，这时天皇反而安慰陆相说：“阿南不要担心，朕自有确凿的证据。”通常，天皇一般不用人名相称，只称其官职，如“首相”、“陆相”之类。天皇这时打破戒律，特意用“阿南”相称，表现了对这位曾作了4年（1929年8月—1933年8月）侍从武官的贴身军人阿南大将，及目前国家处于非常时期而满腹苦衷的阿南陆相的深深的慰藉吧。

另外，关于这一“确凿的证据”，有人理解为天皇通过某种特别的途径，得到了美方关于天皇制继续存在的保证。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此事是不可能的。一般认为，是把“天皇语”的“确信”误说成了“确证”。但是，从这一“确信”中，不是听到了求得终战天皇的强烈意志的鼓动吗？

东乡外相的忧虑

以陆军省军务局为中心的政变计划正要实施。我们从《机密终战日志》等中探寻其轨迹。起草政变计划的是阿南陆相的义弟——军务课员竹下正彦中佐，他正是《机密终战日志》的执笔者。竹下中佐下午2点左右，“关于昨日(11日)以来计划为治安维持(以此为名目)，由东部军管区及近卫师团在宫城、各皇族家、重臣、阁僚、广播局、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等要地配置兵力，守护陛下及皇族，并保护各位要人这样伪装的政变计划，向若松次官谈了具体意见。”依靠政变一鼓作气建立军事政权，并在其领导下，取消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承诺，同时毅然决然地进入本土决战。

次官很慎重，不仅没立即就计划作答，反倒含含糊糊地说，民间的恐怖行动不好吧？还说，大臣今后出席内阁会议，把计划作为备忘录让他看看可以吧。备忘录经大臣秘书官、次官的手送给了大臣。可是，竹下中佐一出次官室，就见到门前集结着参谋本部，陆军省军事课，军务课等部门的十几个少壮将校，他们怒目相向，用严肃的口吻，齐声要求直接向大臣申述否定《波茨坦公告》的意见。

一得到大臣的允许，陆军次官及二、三位局长，还有课长等陆军省的主要成员，就都同意了，这就成了代表陆军的意向。他们十几人一起闯进了陆相办公室。陆相脸上仍是与往常同样柔和的表情。他制止了他们，规劝了其部属成员之间的要相互信任。竹下中佐说：以防万一，请东部军及近卫师团参谋长下命令作好准备。陆相很干脆地同意了，向次官下达了要采取的措施。竹下中佐所说的“万一”，不言而喻就是政变的发生。因此请了两位参谋长，这不表明大臣暗中同意了政变计划了吗？至少，在少壮将校们的心中确信“大臣同意”，由此迈出了走向政变的第一步。

12日下午3点，围绕《贝尔纳斯答复》，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

东乡外相逐条说明了外务省的解释。其要旨就是，依据《答复》，原则上天皇的地位确实存在，因此，要求修改字句，会白白给对方的强硬派以口实，甚至有可能提出否认皇室的要求。所以，虽然对《答复》未必感到满足，可是也就这样了结了吧。阿南陆相马上反对。他依据军务课写成的《关于指导战争的文件》，强硬地主张，国体问题（一项、四项）、解除武装和保障占领问题都有必要作为条件提出。接着，另外二、三位阁僚也谈了与陆相意见一致的看法。而且，不知怎么的，铃木总理发言说：“在这一答复文中，没能确认保持国体；另外，解除武装也完全照对方的意志办，这些是军人难以忍受的，我要再次照会联合国。如不答应，不得已还要继续战争。”

东乡外相听后十分惊讶，陷入困境。他想，如果内阁会议这样开下去的话，会得出不得了的结论。因此，他敷衍地说道：“正式《答复》还未到。”不管怎样，把会议导向结束了。然后，东乡外相在另一房间会见了总理，带着严肃的表情说道：“我很难同意刚才首相的话，希望您知道，也许我要单独上奏天皇。”如将此事上奏天皇，就会因内阁意见的不一致，导致内阁总辞职这样最坏的事态。对此，外相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下午6点半，他向木户内大臣作了说服总理的“紧急申诉”。

尽管如此，铃木总理为什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我询问了作为总理“化身”的书记官长迫水先生。他说：“按我的理解，那是12日上午11点，东乡外相拜谒天皇，谈了接受《贝尔纳斯答复》的意见，并得到了天皇的同意。陛下说：‘不要切断（与美方的）联系。’这话外相对我也说了好几遍。在内阁会议上，阁僚中提出再次照会的意见时，外相对抗说：‘如果提出照会，会断绝联系。陛下说过不要切断联系，这事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且说总理，下午近1点，他接受了平沼枢相的拜访，责难从国体论的角度得出的激烈的反对意见。当时我不在场，可平沼先生顺便也到了木户先生处。因为谁都知道如再次照会美国，就会与美方断绝联系。”

所以平沼问道：‘不能再次照会吗？’平沼那样说，如果我也断然说那样不可之类的话就好了，可偏偏……。东乡外相带着对总理的反感，到了木户先生处，说道：‘总理实在是在动摇不定着啊！’

铃木先生一点儿也没有动摇。据说他认为，如果有再一次照会的方法，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带有西欧气质的东乡先生和东方气质的总理之间，也许稍稍交错了齿轮。

在东乡外相作为战犯嫌疑关入巢鸭监狱之前，我对他说：‘那时，大臣似乎会过分担心啊’。他回答说：‘确实会担心，我在考虑，如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脸上现出坚毅的神情。”

象《追水回忆录》中说的那样，怎么也难以认为内阁会议是在宽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木户内大臣晚上9点半会见总理，虽然从印象上觉得总理对政体论者的论点相当为难，可还是极力劝说总理此时不能犹豫，拼出性命也要坚决接受的方针。总理也有力地答道：“就那样吧”，因此大大强化了这一意思。

在这次内阁会议进行之际，从下午3点开始，在宫中召开了皇族会议。天皇谈了他对军队的不信任，陈述了他走向和平的坚定决心。会议于5点结束，约7点多，阿南陆相拜访了从皇族会议返回宫邸的三笠宫。根据同行的陆相秘书官林三郎大佐的《陈述录》，陆相似乎是为了通过身为陆军少佐的三笠宫，再一次奏请天皇继续战争，以鼓舞士气。在返回的车上，陆相对林大佐说：“皇族以严厉的话批评了我：陆军自满洲事变以来一次也没有符合天皇意志的行动。到了现在这样的时期还继续抗战，深感意外。”

当时，三笠宫是机甲本部副官。在其任中国派遣军参谋时（1943—1944年），他曾感叹过：在中国军纪低劣的‘皇军’，成了‘蝗军’。三笠宫骨气铮铮的话，给陆相很深的影响。“三笠宫殿下及木户都没动摇。看样子殿下对大臣也说了相当强硬的话。尽管大臣有这样的忧愁，但一见到我（竹下中佐），还是像往常一样微笑相迎。”

政变计划的确定

松本外务次官在《手记》中，13日写到：“昨日忧郁沉闷的空气今早突然变得明快起来。我想，这恐怕反映了宫中的意向。比如，根据警视厅给我处的电报，说是象安信内务大臣的态度也缓和起来。”因为顽固的右翼阵营的骚动，一时动摇的总理也重新坚定起来。在这日早上8点半开始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曾在11日早上和梅津参谋总长一起上奏天皇，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军令部总长丰田认为，《贝尔纳斯答复》中的第一项：“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限置于……限制下”中，“只写日本政府不就可以了么？”以此让人看出其软化的预兆。但是，首相仍用手贴进不好使的耳朵，听着强硬派陆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和外相的应答，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们不是在要破坏这一问题而故意说出那样无理的难题吗？”

这次会议持续到下午3点左右。同日下午4点召开了内阁会议。那时，在陆军省：“我们少壮(将校)组，痛感形势的恶化，聚集在地下防空洞里，认真地计划政变。其中有竹下、椎崎、畑中、田岛、稻叶、南、水原、中山安、中山平、岛贯、浦、国武这些原二、三课、军务课各方面的人员。由竹下出示(计划的)大纲，然后分头制定计划的各个细节。并要求严守秘密。现在，我们顾及到天皇决断和保持政体的关系时，就会遇到深刻的问题。在计划中，保护要人，拥护天皇，等待圣虑的变更。在这期间，戒严国政。”

陆军中央部这些少壮将校们的政变计划，还得到前线继续战斗的将兵们的支持，他们呼喊“完成圣战。”当然，外地部队也接收到了《贝尔纳斯答复》。12日夜，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向大本营发电提出了反对意见。“想来，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自开战之初就决定的完成圣战的意志受挫，可能甘心在敌方提出的

条件下屈服吗？在失去战斗力后，国体的维护，皇土的保卫靠谁来保证？”结束时说：“绝对不能服从。”既使这样，还觉得不足，又追加一封电报：“无法考虑靠一时的屈辱，就能确保富有尊严的国体的维护。确信，只有一亿臣民战斗到底才有可能。”

在此前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也发来了几乎同样内容的急电，并进一步说：“数百万陆军兵力没有交替决战就投降，这样的耻辱，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没见过类似的例子。中国派遣军整个8年连战连胜，即使一小分队覆灭，也全部毁坏武器不把它交给敌人。现在，百万精锐部队健在，就向战败的重庆军投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是不能听从的。”“说起来，具有悠久的三千年（历史）、（富有）尊严的我国的国体，应尽全体国民的死力来维护，决不能以向敌国乞求来实现。”

但是，这一天，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官哈尔塞大将命令第三机动部队，对围绕接受《波茨坦公告》不作出明确决定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对日本进行猛烈地空袭。在关东地区，从早晨5点半开始，美舰运载的飞机终日进行了几乎没有反击的空袭和扫射。

内阁会议就是在这种不知何时停止空袭的情况下召开的。在正式答复到达后的24小时，也听到美国广播说日方迟迟不作答复，联合国准备发动新的更大攻势。

铃木总理在这日下午4点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特别慎重地依次点出16位阁僚的名字，要求他们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意见的内容，由被称为“记录魔王”的情报局总裁下村宏作了详细记录，作为《终战记》保存下来。从结论上看，阿南陆相、安信源基内务相、松阪广政司法相等，坚持“再次照会”说；其他的阁僚大致坚持“立刻接受”说。作为陆军代表和陆相是亲友的安井藤治国务相，就陆相等追加的两个条件（自主解除武装、取消保障占领），提出了“还是先单方面通告为好、暂不提条件”这样的“通告”说。铃木总理听了这些意见后，作结论说：“如果这样战下去，纵使背水一战，在原子弹出现的今天，也为时已晚。那样，将不能维护国体。

因此，我打算在这种意义上把今天内阁会议的实际情况下奏天皇，再次仰望天皇决断。”

这样，内阁会议没能得出结论，就在晚上7点左右结束了。总理回到了他的私邸小石川。且说在澁谷松涛建成的新官邸的东乡外相，正与梅津、丰田两总长进行恳谈。他们请求火速会见总理。恳谈长达2个小时，两总长一再坚持应再次照会说，外相没有说话。恳谈快结束时，军令部次长大西到达，他声泪俱下，请求延缓终战的决定，以策划出最后的作战方案。两总长沉默不语。当然，在他们各自的心中盘算着各自的想

就在这(13日)日夜，军务课的政变计划完成了。计划参加者以军务课成员竹下中佐及同课的畑中健二少佐、椎崎二郎中佐、军事课的稻叶正夫中佐、井田正孝中佐，南清志中佐和东条英机大将的女婿——近卫师团参谋古贺秀正少佐及近卫师团的石原贞吉少佐为中心，另外，还有通信学校教官洼田兼三少佐，航空士官学校教官上原重太郎大尉等参加。

有关对陆相、参谋总长、东部军司令官和近卫师团长的劝说和疏通工作，计划中也决定了具体人选。

“一、使用兵力：东部军及近卫师团。

二、使用方针：把天皇软禁在宫中。对于木户、铃木、外相、海相等和平派人士，以武力进行隔离，接着，进入戒严状态。

三、目的：在与天皇有关的我方所提条件得到确实保证前，不得投降，继续交涉。

四、方法：以陆相所拥有的权限，即可以在局部地区临机警备的应急出兵权来发动。

五、条件：陆相、总长、东部军司令官、近卫师团长四人意见一致。”

竹下、稻叶中佐和军事课长荒尾大佐，一起带着这一计划，于晚上8点左右，到阿南陆相官邸，向陆相作了说明。椎崎、畑中、井田等也同行而来。他们还具体说到：“即使作为逆臣，为了

永远维护国体，明天早晨坚决要实施这一计划。”按当时的计划，据说是“今夜12点”实施，可是，因为大臣很晚才回到官邸，所以没能实施。大臣没有马上表示出赞成的意思，他嘟囔着：“我清楚了西乡南洲的心境，”“自己的生命就要交给大君了”，然后闭目不语。但是，到深夜只剩下竹下和他两人时，他说：“因为人多，在那种场合忌讳说话”，表示了他“暗下同意”的心思。

回到市谷台陆军省的竹下中佐，进而缩小计划，提出了如下方案，得到了陆军省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

“据此，明天早上首先与大臣、总长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7点把东部军管区司令官、近卫师团长招来，询问他们的意向。在他们4人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计划当确立。如有一人不同意，也要断然中止计划的实行。实行计划的时刻定为10点”。

御前会议的突然召集

8月14日，炎热的太阳一升起，震人心魄的B29飞机，在东京上空象撒樱花花瓣那样，散下了无数写有日方提出的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和《贝尔纳斯答复》的传单。

对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投降的苦虑和焦躁，还只存在于政府和军部的上层，国民的大多数还处于战争的继续进行的状态中。尽管如此，如果国民从传单中知道了国家的上层正在讨论终战、战败之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木户内大臣感到这样下去，全国的将士会愤慨激昂，导致更大的混乱。因此，上午8点半晋谒天皇，谈了上述状况，“请求下令火速办理终战手续，并得到了天皇的同意。”

同日上午7点，比木户内大臣提前一步，阿南陆相在军事课长荒尾的陪伴下，来到参谋总长室，就政变作了商谈。但是，总长首先“责难在宫城内动用兵力之事，继而对计划没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计划崩溃，万事皆空。”政变计划在梅津总长一句“不

同意”面前，确实还没尽兴，就消失在彼岸的幻想之中了。

内大臣离开天皇身边时，铃木总理进宫。据总理说，两统帅部不同意召开(为再次仰望天皇决断)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陆军说希望等到下午1点。因此，内大臣向总理说了刚才对天皇谈的想法，并说到：“请求召集由阁僚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联合参加的御前会议，承蒙天皇就势下令终止战争、起草终战诏书，除此之外，别无办法。”总理也同意这样，因此，内大臣和总理一起于8点40分拜谒天皇。得到了准许，并决定10点半召开联合的御前会议。

根据《木户日记》及东京审判的《木户供述书》，记载着决定召集御前会议的经过，如上所述，简明、平坦，恰似流水，通俗地说，成了木户内大臣的“独角舞台”。要得出的结论是同一的，但得出的过程似乎稍微复杂些。

在9日的御前会议上，因为迫水书记官长为临席奏请天皇提前请两总长签字，所以就能加以利用了。这次没有两总长的签字，所以在13日下午的内阁会议上，总理说到再次仰望天皇决断时，书记官长略有些焦思苦虑。因此，破例向总理进言：“您说承蒙陛下召见的话如何呢？”另外，也在其它场合谈到：为扩大天皇意旨的影响范围，除6位成员外，再加上全体阁僚和枢密院议长如何？总理全部同意，上午8点多进宫。因此，这时是铃木总理向木户内大臣商议“召集特别御前会议”之事，当然内大臣也同意了。

且说所谓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全体阁员参加的御前会议，从法制方面而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到底也只是决定与战争有关的最高意志的机关，决定国家的意志必须有内阁会议的决定。相反，内阁会议没有任何就战争的前途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在这一非常的时刻，有必要召集自1941年12月1日决定开战以来，未曾召开过的由统帅部和阁僚共同参加的御前会议，正因如此，这是一次“破例”、“特别”的御前会议。不管怎样，这次御前会议的

“突然召集”，可以说是首相及其亲信、内大臣，并也包括天皇在内这些人认识的一致结果，同时，也可说是对军部的一个厉害的“政治圈套”吧。

阁僚们无法知道悄悄“计划”着破例召开的这次御前会议，他们按照前几天迫水书记官长的通知，上午10点准时抵达总理官邸。

听听迫水先生有关此事的谈话吧。“因为说是内阁会议，所以许多大臣没系领带，也没进会议室，聚集在隔壁的休息室里。总理一早进宫见到木户大臣后，决定召开御前会议。回到官邸，对我耳语到：‘大概马上就要召见了。’不一会儿就接到通知。我立即通知大家：‘各位，内阁会议停开，请进宫，据说平服就可以。’阁僚们因为还不明白事情的变化，有人便问我：‘官长，怎么回事？’他们面面相觑，一副紧张的表情。早在9日深夜的御前会议上，大家已经知道有天皇决断，所以，马上想到，也许是马上要终战了吧。这次御前会议，因为没有两总长的签字，所以从形式上讲当然不是正式的御前会议。如果说得明白些，因为要承受陛下的‘训谕’，所以筹划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成功的。

当时，在宫中正在召开有畑俊六、杉山元两位陆军大将和永野修身海军大将三位参加的陆海军最高军事首脑会议。因为陆相的请求，所以身为大元帅的天皇，在会上说明了决定终战的经过，同时还期望三位元帅的协力。

在陆军省传说上午只开内阁会议，御前会议延期至下午1点半召开。这说明当时已经很混乱。……

但是，聚集在内阁会议上的阁僚及平沼、两总长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干事(书记官长、陆海军务局长、总计划局长官)，突然在10点30分被召至宫中，历史性的御前会议突然召开，划世纪的天皇决断就要下达了。”

从上述两次出现“突然”一词，就可以看出陆军出乎他们意外的惊愕。所以，按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令人想到，陆军昨夜的(政

变)计划,可能与这次御前会议的变更过程有某种关联,即部属中可能有与政府通信的人”可是,在这些纷乱的消息中,还有消息说“总长坚定了决心,要与大臣一同坚持到最后,因此,应急速完成《兵力使用第二方案》”。当时的情况虽然说不上是“风声鹤唳”,但是,形势已是很紧张了。竹下中佐的《兵力使用第二方案》内容有:

一、用近卫师团对皇宫及其外围实行戒严,切断与外部的交通通讯;

二、东部军在城内各要害处布置兵力,保护要人,控制广播局等;

三、即使天皇决断下达,也要坚持以上态度,谨慎地等待圣衷的“改变”;

四、为实现上述各点,要以大臣、总长、东部军司令官、近卫师团长等人意见的一致为前提。

前面说:“即使成为逆臣”也要决然实行政变,可是指出作为其条件大臣等4人意见的一致又是绝对必要的。而且第一次遇到总长的“不同意”就干脆中止了,可这一次又把他们的意见一致当作了必要条件。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天皇亲率的日本陆军“律义”的特性。

“这时,大臣正在召开内阁会议,我们认准御前会议在下午举行”“竹下带着上述计划来到宫内省,马上知道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及全部阁僚正在宫内被召见。”这就是处于被动的政变派的少壮军人们。

天皇第二次决断

这次御前会议是在宫内喷泉御苑地下很深的防空洞中举行的。有关天皇作出第二次决断的情况,请听一下迫水书记官长的话吧。

“因为在官邸紧急被召，所以，大臣们只好从秘书官那儿借了领带，有人还换上了秘书官的衣服。他们各自乘车向宫中奔去。记得似乎是在宫内省会合后，又乘车奔向文库的地下防空洞。似乎只有池田计划局长官步行去的。因为我是第二次到地下防空洞，所以多少熟悉一些地下情况。可大臣们默默地只凭感觉前行，似乎自然地模仿着宫中的座次。

一进入会议室，就看到在陛下的桌子前面，已整齐地摆了三排椅子，就想到‘果然那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9日深夜时，以陛下为中心，把椅子排成了「」字形。这并不是内阁的请求。因此，没有规定谁坐在哪个椅子上，但是，在这里自然要按宫中座次的顺序，这样，我就选了第三排面向天皇的最左边的椅子坐下了。

约过了两、三分钟，左边的门开了，在我们站立低头等待的过程中，穿着大元帅服的陛下入座，我们也坐下了。我9日看到陛下时，他的头发似乎有些散乱，可今天却没有了那样的感觉，但仍带着沉痛的表情。

坐在最前排的总理首先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两个躬，低下头后说：‘再次仰望天皇决断’。接着简明扼要地说明了10日以后，即第一次天皇决断后的情况，并表示歉意。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很吃惊地发现总理没拿发言稿，凭口说道：‘对方给了我们这样的答复，有人提出这不能维护国体，请——’他对天皇说，想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并由他首先指名阿南陆相发言。阿南陆相站了起来，说：‘照答复条件，不可能维护国体，’说着声泪俱下，这与他平日爽朗的谈话迥然不同。他说了大约五、六分钟。接着，梅津、丰田两总长也分别站起来作了说明，谈得很简单，每个人似乎只用了一、二分钟。

于是，陛下说话了。为记录陛下发言，我已准备了纸和圆珠笔，可他一开口，大家都已哭出了声，我也一样，结果又没能作记录。陛下用白手套由上往下擦了两、三次眼泪。他说：‘如果再没人发言的话，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刚才，分别听了反对派的

意见，我的想法与以前讲过的一样。我充分研究了世界的现状和国内的情景，觉得再继续战争是不理智的。据说，关于国体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疑义。我看了那个《答复》的内容，理解对方具有相当的善意。对方稍感不安，大致也是合乎道理的。对此，我不想怀疑什么。因为我想，重要的是我全体国民的信念和觉悟问题，所以觉得可以接受对方的要求，怎么样？请大家也那样考虑考虑。

再就是对于陆海军将兵来说，解除武装，保障占领，确实是难堪之事，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不管自己如何，也要想想拯救万民的生命。再继续战争，结局必会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片焦土，使万民遭受更大的灾难，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的。那样，会愧对祖宗之灵。即使依靠和平手段，当然也难于完全信任对方的做法，但比起日本完全毁灭，即便多少留下一些种子，也会有光复之望。

我追思三国干涉时，明治大帝含泪断言的苦衷，现在希望大家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共同努力，以挺立于将来光复之时。我想到在此之前阵亡或殉职，死于非命的人们及其遗属时，悲痛难忍。至于蒙受战火灾害，失去家乡的人们的生活，更使我深为担心。

此时，如有我应做之事，什么我都不会厌烦。如需要号召国民的话，我随时可以站到麦克风前。一般国民到现在什么还不知道，因此，突然听到这样的决定时也会相当不安吧！陆海军将兵中间的动荡会更大吧。对此进行劝解会相当困难。希望陆海军大臣好好理解我的心情，共同努力，平定好将士们的情绪。必要的话，我亲去劝谕也无妨。现在有必要拿出诏书了吧，望从速起草。以上是我的考虑。’

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的御前会议到此结束了。结束时，太阳稍稍转过了正午，象往常一样，辉照着当空。”

旧的昭和时代结束了，苦难的新的昭和王朝的帷幕正在拉开。

陆相前来请假

下午1点，召开了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结束战争。接着审议《终战诏书》。诏书草稿是在迫水书记官长的主持下，从10日黎明第一次天皇决断下达后开始起草，以“再现天皇的御旨”为基础完成的。其内容在《终战诏书》一章中有详细叙述。

人的表情会因对诏书的立场和心情的不同有相当的差异，对于阿南陆军大臣来说，从御前会议结束后，其心情如他的秘书官林大佐所观察的“没有与平日不同之处”。可竹下中佐却显出了“沉痛”的表情。陆军始终强烈主张的“政体的维护”没有被采纳，因此“自语道：大臣辞职，拒绝在诏书上署名会如何呢？阿南内心斗争激烈，他要命令林秘书官准备辞表，可是如果辞职，必会导致颁布陆军大臣缺席的诏书，而且不能到天皇面前问安了。陆军大臣嘟囔到这里就停止了。”

陆相回到陆军省后，军事课、军务课的少、中佐班的二十多人，面色苍白地把他围在了大臣室。陆相淡淡地说了御前会议的情况。军事课的井田中佐追问道：“我想请教大臣变更决心的理由。”陆相似乎抽噎着回答说：“陛下对我流着泪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虽痛苦可要忍耐。作为我，不能带头反对。”接着，陆相以决然的语气激烈补充道：“不满者先斩阿南。”“这样，陆军的大势已定，昨日的强硬论也云散雾消，今天唯有安心而已。”井田中佐在其《手记》中作了这样的记录。只有畑中少佐放弃陆军中央，继续依靠“少数精锐”，向着政变的“爆发”奋斗。

此时，广播协会(NHK)接到了下村宏情报局总裁的命令：天皇《终战诏书》决定录音广播。下午3点前，带着录音班来宫内省报到。宫内省也收到了内阁关于广播天皇录音的指示。

另一方面，14日下午2点40分，在陆军接待室，正在召开陆军首脑会议，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土肥原贤二教育总监、

畑俊六、杉山元两元帅、陆军次官、参谋次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陆军省参谋本部局长及主要课长等人出席，正式决定了承诏必谨的“陆军的方针。”“皇军要彻底遵从天皇决断行动，”各长官都一一签名。同日下午6点，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在国外的军队发出了《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传达了天皇决定终战之意旨，并告戒“为了皇军永远的名誉和光荣，”不得采取轻率的行动。

晚8点半，《终战诏书》由铃木总理交给了天皇。天皇署了名，盖了御玺。全体阁僚署名完毕，已是晚10点左右。外务省于晚11点，迫不急待地给驻瑞士公使加濑、驻瑞典公使冈本发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之件》的急电。加濑公使回电：“14日下午8点5分，本大使向该国外务次官通告了贵电通告文。”发电时间是伯尔尼时间8点42分，外务省于15日上午9点5分收到。

8月6日对广岛投放原子弹，而加快的终战步伐，经过天皇两次决断，到此终于完成了必需的各种手续。然后就是把这一冷酷严峻的事实，尽快地告诉给国民。

11点多，阿南陆相拜访了首相铃木，说他在停战的议论发生后，之所以继续阐述强硬的意见，唯有在于维护国体，并深表歉意。为了喜好抽雪茄的总理，这是从南方前线上得来的。说着，把雪茄递给了总理。书记官把陆相送到正门，回到总理室，只听总理自言自语：“阿南君是来请假的啊！”

叛乱的陆军

同日下午11点20分，在宫内省办公室，天皇正在进行终战广播录音。天皇读完诏书说道：“这次似乎声音低，不顺利，再读一次。”又以他那独特的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读了一次。是声音稍微高了点吧？还是紧张的原因呢？文中的接续词漏掉了一个，他说再读一次吧，石渡庄太郎官相和藤田尚德侍从长答道：“这样就

可以。”当时的时间已是14日夜里23点50分。两次的录音盘都由德川义宽侍从收藏到了侍从职事务官室的轻金库里。天皇在深夜结束了录音，他比任何人都会把这走向终战的漫长一天，深深刻在心间。当天皇回到文库就寝时，已是15日凌晨1点左右。但是，不一会儿，皇室警察官来报，近卫兵起事，正在宫城内搜索录音盘。“叛乱”终于在天皇身边发生了。

在此之前，14日夜里11点左右，带着必死表情的畑中少佐跑到时在骏河台旅馆的竹下中佐那里，说道：“趁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芳贺大佐本日上午上班守卫之机，并有1个大队增援，捧持军旗，决定于本夜2点举事，采取措施，坚守宫城。近卫师团中另外还有4个大队同意奋起。”

芳贺丰次郎大佐指挥的近卫步兵第二联队布置在宫城内。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已通知芳贺联队长，在青年将校中间将有危险的举动，指示他在14日特别要以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的全力来守卫宫城。但是，畑中少佐、惟崎中佐通过近卫师团参谋古贺、石原少佐，得到了近卫师团主要的大队长、中队长对以政变来阻止终战的同意。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握有兵力的既不是陆相，也不是参谋总长，而是近卫师团长。近卫师团的行动，必须有他的同意，这次行动是否师团长真的同意了呢？畑中少佐继续说道：“我在此之前也曾劝说师团长，如果他不听，我就要杀死他。石原、古贺两参谋同意这样。”竹下中佐说：“让我到大臣那里，劝其按今早的计划(《兵力使用第二方案》)，以近卫师团的奋起为契机，发动全军奋起。”

竹下中佐曾是近卫步兵二联队的旗手，对于在军旗下的政变，竹下中佐也是会动心的。但是，“(竹下)认为，东部军队不行动，就不会解决问题。近卫师团长也会觉得为难，东部军到了现在恐怕不会同意，因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就劝他悄悄中止计划，但未能动摇畑中少佐的决心。”阿南大将曾是近卫步兵二联的队长。军旗的摇动对于竹下中佐来说，只会觉得那是命运，是天意。

竹下一度劝说过要中止计划。

“(竹下)约畑中去大臣那里,但是,他与昨天以来的决心相同,要以近卫师团长、东部军司令官的同意作为先决条件。如果近卫师团长断然作为代理者,决定行动的话,不管怎样,在东部军司令官还没行动时,不得要求大臣发布命令。如果两者策应奋起的话,即尽力劝说陆相奋起。我和畑中作了这样的约定。”两人共同乘车出发,到了陆军省后,竹下中佐在大臣官邸下车,畑中少佐向近卫师团奔去。

15日零时左右,师团长森赳在宫城内巡视之后,回到师团长室,换上和服,对先一步来劝说的井田、惟崎中佐说:“我十分了解诸君的意图,很钦佩你们的坦率直言,我作为真正的日本人,也想马上去明治神宫的神像前叩拜,接受最后的决断。”说到这里时,碰巧参谋长水谷一生大佐出现了,师团长让井田中佐也听一下参谋长的意见。井田中佐正要进入参谋长室时,碰巧畑中、窪田少佐、上原大尉一拥而入。井田中佐让畑中等在师团长室等待,就进了参谋长室,谈了约有十分钟左右,突然从师团长室传来叭叭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混乱的枪声、重靴声和吼叫。井田中佐等跑去看时,畑中少佐拼命喊道:“因为时间紧迫,就干掉了。”只见师团长及其义弟畑元帅,还有今天早上乘飞机从广岛来东京拜访师团长的白石通敬中佐,都死在了血泊之中。用军刀刺死白石中佐的是窪田少佐。

此时,在陆相官邸的日本式房间里,阿南陆相和竹下中佐正静静地对座着。陆相在一张纸上写有:“一死以谢大罪,1945年8月14日夜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背面写着:“确信神州不灭”。在另外的半张纸上,写有:“深沐皇恩之身,无后事可托。”这二位义兄弟喝着诀别的酒一直到夏日正要升起的早上5点左右。二人的别离也是和“帝国陆军”的永别。阿南陆相穿上天皇给的衬衫,然后用短刀剖腹,又把锋刃刺进了脖子。

枪杀森师团长的畑中少佐向宫城奔去,井田中佐急忙赶往好

似第一生命的日比谷的东部军司令部，惟崎中佐和古贺、石原少佐起草了“伪”近卫师团命令。近卫步兵一连长把主力放在宫城，由一中队占领东京广播局，中止广播，近步二联长仍然令部队守卫皇宫外，这样，他们的行动目标不言而喻，就是中止天皇《终战诏书》的广播。用武力夺取藏在皇宫内的录音磁带，就是他们行动的目的。

叛乱的士兵们，以宫内省为中心，在天皇居室义库附近设置了机枪队。把下村宏总裁及广播局全体人员监禁于坂下门。宫内省的电话线被切断，木户内大臣、石渡宫相、侍从们到地下金库室避难。德川侍从急中生智，把“女官浴室”的牌子放在了入口处，所以手持战刀将校和士兵们只是在入口处转了转就过去了。

天皇听到非同寻常的骚乱声，穿着军装一会儿到屋子里坐下，一会又跑到院子，忧虑着事态的发展。他把藤田侍从长召到文库读书室，用沉闷的声音说道：“藤田，那些人究竟打算怎样？他们为什么不明白我这不可改变的心情呢？”

古贺参谋告诉芳贺联队长，师团长虽勉强，但也同意了（叛乱），陆相不久也会到来。可是，联队长表示怀疑，就打电话和东部军参谋长高岛辰彦少将联络，知道了“师团命令”是伪造的。于是，喊叫道：“今后，贵官们的话再也不听了。”

天明后，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和幕僚们一起来到了宫城，对惟崎中佐等进行劝说，并命令联队长撤兵，然后向天皇报告事件已解决。内大臣、宫相们和下村情报局总裁等被放了出来。当时，总理官邸、铃木总理私邸、平沼相邸、广播局等都受到了包含学生在内的行动队的袭击，但都没成大事。

这些一向自吹的天皇股肱的陆军中央的少壮将校们，胆敢抛弃由天皇统帅这一军队存亡的大原则，发布假命令，乱用兵力，发动叛乱这一连串的行为都表示政变者企图掌握权力的目的。古贺少佐参拜了皇宫内的内殿后，上午10点左右，在森师团长的遗体前剖腹自杀，惟崎中佐和畑中少佐，上午11点20分，并列坐

在二重桥和坂下门之间的草坪上，用手枪自杀了。之后，负有战败责任的原参谋总长杉山元元帅、田中静壹大将、大西瀧治郎中将及许多陆海军人自决而死。

8月15日正午，从收音机里传来《君之代》的声音，接着，国民初次听到了天皇的声音。

在宫中防空洞内的会议室里，召开了追认终战的枢密院会议，天皇出席了这次会议。此时，他坐在会议室旁休息室的御座上，面前放着小型收音机，听着自己的声音，不时拿起桌子上的白手套擦着眼泪。

下午2点召开了内阁会议。由铃木总理提议，内阁总辞职。